读《湘行散记》有感

再读《湘行散记》，又一次感受到了从文先生那如水一般的文字带着湘西的秀丽山水，带着浓浓的湘西风情，带着对生命，对历史的感悟静静流淌而过。文字虽如水，过而无痕，却沉淀下了太多的叹息。

《湘行散记》收录了从文先生的《湘行散记》、《湘行书简》、《湘西》及《烛虚》等作品，可以说贯穿了从文先生20、30、40年代三个时期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创作在纵向发展上，因表现形式的的差别体现出三个阶段的不同风貌，展示出从文先生对生命意义始终如一的探究。

《湘行书简》作于从文先生回家探母途中，是他与夫人张兆和的一组信札，以散文般的文字描写了先生归途中的所见所闻，后来的《湘行散记》即是根据这些诗意的信札写成。仅仅是六篇散文，那条纵贯湖南西部的河流以及两岸的风光民俗人情，就被用清新优美的文字展现在世人面前。

沅水发源于云雾山，穿行于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之间，最终汇入洞庭湖。沈从文乘船经过的是桃源与麻阳之间的一段，属于沅水的中下游，两岸风光秀美，但由于重峦叠嶂，交通极为不便，因而自古以来就养在深闺人不识，充满了神秘性。沈从文的老家凤凰位于沅水中游，他在这儿长大，而从十六岁起他就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这里的山川景色早已深深刻在他心里。因而，他一提起笔，美丽壮观的景象就跃然纸上， “全河都是大石头，水却平平的，深不可测，石头上全是细草，绿得如翠玉，上面盖了雪，而小船就在这左右是石头的河中行走，实在让人感到妙不可言。”“岸边偶尔出现以吊脚楼和石板街组成的村墟市镇，高矗两岸，巍然壮观”……沈从文的文笔胜于丹青，如水般流淌而过，一幅幅沅水两岸的秀美图景就被勾勒了出来。他的文字是平实的，毫无刻意夸饰之处，往往寥寥几句就让人如闻如见。而比风景更动人的，是那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藏于心底融入血脉的对于家乡山水的倾迷爱恋之情。

然而，如果沈从文仅仅是描绘沅水两岸的自然风光，那么他与那些纵情于山林的文人雅士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沈从文并不是为了描写风景而写风景。他的风景，往往是做为沅水沿岸“人事”的背景而出现的。他的笔墨更多地落在了在这条河上谋生、在河两岸生活的人的身上。在沈从文笔下，那些有了酒喝就兴高采烈、行船如飞的纯朴的船夫，那些住在吊脚楼里敢爱敢恨、情意绵绵的女人，那些看到龙船比赛就高兴得大喊大叫的孩子，那些在矿山挖煤的“黑脸黑手脚”的汉子，那些勇敢而又和气的兵士，乃至于那些粗暴而又不乏豪爽的土匪，组成了沅水两岸特有的乡野人文景象。有关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的故事，是那么平常，却又那么撼人心魄。沈从文对这些世代生活在高山峻岭之中、河流峡谷之间的人们是不乏深挚的同情之心的。他为他们的“生活皆很悲惨”而难受，为“地方经济”的“一天比一天坏”而感到担心。然而，读《湘行散记》，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沈从文对这些人发自内心的感动：感动于“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负担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感动于他们“不管怎么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感动于他们“在他们那份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从他们身上，沈从文感悟到了“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他感悟到了什么？沈从文并没有具体说明。但从他那平实而蕴涵激情的文字中，我们分明能听到他的心声：历史是一条河，它是由一代又一代像生活在沅水两岸的地位“低微”的山民那样的人群汇成的；也许他们一辈子都默默无闻，与豪华和辉煌无缘，但他们的为生存而生存的朴拙的人生同样是庄严美丽的。

壮美的风光和朴拙的人事交织辉映，贯穿于《湘行散记》全书的始终。从那一篇篇文字里，我分明感到，虽然他已经远远离开了家乡，虽然他早已不是住在河边的顽童和辗转流动的土著部队的士兵，而成了一位颇有名望的著名作家，但他似乎还常常生活在沅水流域过去的梦里。他用文字把湘西沅水流域构建成一个想像中的王国。《湘行散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沅水流域的一部短短的生动的历史。因了他的这些文字，湘西沅水流域过去某个时代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就永远保存了下来，并在一代代读者心中回荡。而沅水，这个奔流于湖南西部崇山峻岭之中的普通河流也就和沈从文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人们谈到沈从文，自然会谈到他的有关湘西的文字，谈到风光壮美的沅水；而只要说到沅水，人们恐怕也不能不联想到《湘行散记》中的优美的文字和它的作者沈从文。

迥异于先生的小说《边城》、《长河》的牧歌氛围和乐观超越，在散文中透露出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意识——一种面对特殊的历史场域，透过表层的血与泪，体验一份人生的庄严。那一篇篇如水般的散文，却能将尖锐的民族问题与社会矛盾，融汇在人事的叙述中，或反思文明与堕落的复合关系，或沉醉在爱的憧憬里流露出对爱的毁灭性的隐忧，或感动于原始生命的力量的同时流露着对原始生命活力无从改造与转移的忧惧。

我常常想，沅水作为一条河，不仅带给从文先生灵感和感悟，更带来了面对人生苦难的勇气。晚年，先生因政治环境所迫，放下了手中写作的笔。在以后的数十年里，他没有像许多文坛大师一样变成附庸于政治的文臣，而是默默地转而从事文物研究，并在这个新的领域里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果。我想，使他能够面对磨难坚韧不拔的，正是那条静静流淌的长河，以及那些人，那些事。